

1973年以来的美国会计学术

周华^{1,2,3}(博士生导师)

【摘要】实证研究成为1973年以来美国会计学术的主流范式。这是会计教师任职资格变化、金融界利益诱导、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引导、政界倡导放松管制、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标准恶化、计算机和数据库普及、公司金融理论迎合华尔街需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统计分析只能基于数据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提供佐证,而不能证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实证范式的流行,必然将会计学术引入歧途。

【关键词】实证会计;统计推断;假设检验;会计学术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9)14-0075-7

公共会计师行业在拱手把规则制定权交给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之后便不再有兴趣讨论会计规则,这时候主导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其实已经是证券行业。相应地,学术界这个时候逐步向“实证会计”研究范式转变。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基础的研究范式成为主流会计学术刊物的标准范式。实证会计研究特指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或称计量分析方法、数量分析方法等)和公司金融理论所进行的量化分析,又称“经验研究”。主导实证会计研究范式的其实是缺乏科学成分的公司金融理论而不是会计理论。

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在引领实证会计潮流?为什么一定要把实证会计研究范式推崇为主流范式?几十年来有什么实证研究成果能够接近《公司会计准则导论》的学术水准?

一、实证会计的形成与传播

(一)实证范式异军突起:学术范式的转变

1. 弗里德曼带领芝加哥学派推广实证经济学。1953年,拥有突出的统计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统计实践经验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提出,实证经济学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伦理立场和价值判断,它关注“是

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实证范式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或“假说”,对尚未被观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义的推测^[1]。此观点一出,一些经济学泰斗纷纷质疑,争论至今未平^[2]。其实,这一观点只是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一小部分。弗里德曼以宣扬自由主义(货币主义)而为世人所瞩目,他主张开放市场、放松管制、企业私有化。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国内学术界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极尽追捧,其后果是造成了人们对于国外(尤其是美国)经济学的迷信。在此背景下,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以及实证经济学的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新宠。

诺贝尔经济学奖项的设立主要是因为数学被大量引入经济学,以及人们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而且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所奖励的主要是发展分析工具的数学家而不是提供思想洞见的经济学家。因此,这个奖项的设立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学朝数理方向发展,甚至使得主流经济学几乎蜕化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问题是,经济学毕竟是一门关注现实生活的社会科学,但这一奖项的激励却使得经济学日渐脱离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从而使得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研究品牌计划)“我国会计法规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兼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困境及其改进”(项目编号:16XNI006)

距离越来越大。可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取消将更有利于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防止经济学蜕变成自我演绎的“我向思考”学科^[3]。

2. 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学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浓缩。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提出了一套新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特别注重构造新假说,主张学术研究应当围绕检验新假说展开。由此,实证经济学就走上了“灵光乍现”式的细化研究的道路。实证会计正是这种思潮的产物。

(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推广实证会计研究范式

沉浸于实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会计研究者运用统计分析软件,把实证经济学视为开山立派的捷径,由此创建了实证会计流派。

1.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开风气之先。尼古拉斯·都彭1961年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博士毕业后加入芝加哥大学,是实证会计的领军人物。他在芝加哥大学供职22年,兼任多家杂志的审稿人,自1968年至1983年担任芝加哥大学创办的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的编辑。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都彭善于启发青年学子并引导他们走上实证会计的道路,一手把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打造成为美国高校争相追捧的热门期刊。都彭没有发扬其母校伊利诺伊大学及其学长A.C.利特尔顿的治学风格,而是选择了从事实证会计研究,其原因令人费解。

1963年,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创办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创刊伊始,该杂志在推广时间序列等热门统计技术的同时,还着重讨论会计理论和管理会计实务等方面的问题。但自1966年起,该刊物的导向便开始明显地向经验研究转变。威廉·H·比弗的一篇预测财务困境的论文就刊发于1966年该杂志的增刊“经验研究论文集”中^[4]。

1968年,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第6卷)第2期刊发的瑞·鲍尔和菲利普·布朗师徒二人合作的《会计盈余数字的经验研究》一文对会计研究导向产生了深刻影响^[5]。该文研究的是会计盈余数字对股价表现的影响。两位作者借助统计分析方法,声称会计盈余与股价表现之间具有显著的统计关系,但该文在理论上乏善可陈,甚至存在明显的误导性。正如英国著名会计学者、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生安东尼·G·霍普伍德所言,鲍尔和布朗1968年的所

谓开山之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在分析方法上有些新意。

与《会计盈余数字的经验研究》一文同期刊发的,还有比弗的《市场价格、财务比率与财务失败之预测》一文,该文还没有把会计数据引向证券估值,研究方法属于统计学的判别分析,与鲍尔和布朗在具体统计方法的选择上存在差异^[6]。这篇文章也因此没有被列为开山之作。偏好经验研究的凯瑟琳·希珀自1985年至1999年担任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主编长达15年,她后来入选美国会计学会会长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她曾以美国会计学会会长的身份,于1995年参加中国会计教授会成立大会暨1995年年会,并在中国会计教授会1996年年会上介绍了实证会计研究方法。

2. 罗切斯特学派:芝加哥学派的衍生学派。

(1)詹森1976年的宣言。实证会计研究范式的倡导者之一、罗切斯特大学青年教师迈克尔·C·詹森1976年在斯坦福大学发表题为“关于会计研究现状与会计监管的反思”的演讲。他提出,规范会计研究虽然也形成了会计理论,但它不是“科学的”研究范式,人们如果更重视实证范式,就能够获得更为重大的进展。詹森的言论预示着罗切斯特大学将与传统会计学术分道扬镳。

詹森自1967年起供职于罗切斯特大学西蒙商学院,1967~1971年任助理教授、1971~1979年任副教授、1979~1984年任教授,1984年至1988年任讲座教授,1977年在罗切斯特大学设立管理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管至1988年。詹森自1967年到罗切斯特大学任教起,在该校供职长达18年,他的学术旨趣主要在于企业管理和金融领域,在会计理论方面较少涉足。他是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的创刊人。

(2)瓦茨推出“实证会计”这一标签。罗斯·L·瓦茨是实证会计研究范式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自1972年起,罗斯·L·瓦茨就开始发表基于统计方法的公司财务文章。1978年和1979年,瓦茨和齐默尔曼接连在美国会计学会会刊The Accounting Review发表题为《实证理论与会计准则之决定》《会计理论的供求:以市场为着眼点》的文章,提出了以“实证方法”为会计准则的制定提供“经验证据”的主张^[7]。1979年,由罗斯·L·瓦茨和杰罗德·L·齐默尔曼担任主编的《会计与经济学杂志》创刊。1986年,二人合作出版了《实证会计理论》一书,该书所称的“实证

会计”是狭义的,其内涵仅仅是指运用公司金融理论所做的统计分析。他们的论著一度被称为会计学上的“罗彻斯特学派”。

随着实证会计的不断发展,美国会计学会1926年创办的会刊、老牌刊物The Accounting Review也渐渐改变了办刊宗旨。到了20世纪80年代,实证会计研究范式已经成为美国会计学术的流行范式。

(三) 实证会计在英国和加拿大的传播

1. 实证会计研究范式在英国的传播。英国著名会计学者安东尼·G. 霍普伍德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回到英国推广实证范式,他于1979年创办的《会计、组织与社会》杂志包含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广义上的实证研究方法,办刊风格独树一帜,与所谓的北美“顶尖”期刊存在差异。但随着实证会计的流行,该刊刊登的理论文章所占比重逐渐下降。霍普伍德晚年对学术范式转换的原因及其影响撰文进行了反思。

2. 实证会计研究范式在加拿大的传播。加拿大会计学会(CAAA)会刊《当代会计研究》1984年秋季创刊,创刊主编是哈伊姆·福尔克。威廉·斯科特于1989年出任第二任主编。斯科特本人所做的会计理论研究大多是围绕有效市场假说展开的,侧重于证券市场和信息经济学^[8]。在这种理论导向下,《当代会计研究》的办刊风格与北美实证会计刊物基本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会计研究》第五任主编共有两位,其中,杰拉尔德·A. 费尔特姆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毕业生,他于1967年博士毕业后在美国工作数年,1971年回到加拿大。

二、美国会计学会1977年的再度转变

在实证会计异军突起的大背景下,美国会计学会的管理委员会于1973年组织成立了一个由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的克米特·拉尔森领衔的研究组,要求其针对1966年《基本会计理论公告》发行以来的学术研究进行理论回顾,写出一份富有思想性的会计理论总结公告。该研究组自1973~1974年进行了初步研究,然后交给由西北大学的劳伦斯·雷夫辛领衔的团队继续研究。最终,由雷夫辛率领的“对外财务报告的概念与准则委员会”于1977年提交了上述研究的最终成果《关于会计理论与理论认可的公告》。

我国一些学者对这份公告极为推崇,但其实该公告应该算是美国会计学会所推出的最糟糕的一份理论公告。

第一,《关于会计理论与理论认可的公告》是一份感想式的公告,缺乏理论主线。该公告没有提出自成一体的观点,也就没有办法清晰地梳理过去十年的诸多成果。全文引用了大量的文章,但很少提出理论观点,该公告主要是罗列规范研究的经典之作以及实证研究的各种选题。这种做法不但没有形成更加简洁清晰的理论框架,反而对人们把握理论脉络产生了干扰。例如,《公司会计准则导论》既采用了归纳推理又采用了演绎推理,很难用该公告的分类标准去归类。再如,该报告明显受到了有效市场假说和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范式转换的溢美之词。文中大量引用雷夫辛等的文章,而雷夫辛正是领衔该研究项目的“对外财务报告的概念与准则委员会”的负责人。从主笔起草该公告的“对外财务报告的概念与准则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来看,该公告写成一个大杂烩实属意料之中。其成员包括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鲍茨曼、斯坦福大学的戴姆斯基、德保罗大学的唐纳利、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的拉尔森、西北大学的雷夫辛、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斯托布斯、莱斯大学的司德凌、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韦安特以及杜兰大学的泽夫。这个时候利特尔顿已经去世,佩顿已经退休,仅靠会计史学家泽夫是难以征服以斯托布斯为首的倡导决策有用观的学者的。

第二,该报告把库恩对自然科学史的哲学思考,照搬到作为社会科学的会计学科上面,这种移花接木的写法立即受到了指责。美国会计学会1973年成立这个研究组的初衷是让他们提出一套理论学说,直接照搬的做法显然有违初衷。

第三,该报告的作者简单地把既有文献用三种理论模式概括,缺乏合理的分类标准。该报告关注的是学界的异议而非共识,其基调是消极而不是积极的。对于迫切需要理论支持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来说,美国会计学会的这种做法显然不能发挥什么积极作用。

总体来看,《关于会计理论与理论认可的公告》的理论贡献乏善可陈,同时暴露了美国会计学会缺乏自身学术立场、美国会计学术研究缺乏鲜明理论主张的真实局面。在新自由主义兴起以及学术期刊、学术资源私有化的大背景下,“后起之秀”基本上都是有效市场假说、新自由主义和实证经济学的拥趸。美国会计学术界早已不是罗斯福新政时代的会计学界,面对缺乏立论基础的实证会计研究,谁都难以总结出一份像样的学术报告。

三、实证会计流行的原因及批评意见

(一) 实证会计何以流行

实证会计范式之所以流行于美国,是会计教师任职资格变化、金融界利益诱导、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引导、政界倡导放松管制、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标准恶化、计算机和数据库普及、公司金融理论迎合华尔街需求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会计教师任职条件的变化。实践中精通会计业务的会计教师不一定拥有博士学位,但往往持有注册会计师证书。但1965年美国会计学会却枉顾这一事实,提出相反的主张。该学会倡议会计教师应当具备博士学位,而注册会计师证书则不再被列为必要条件。这一转变对学术研究导向影响甚大,导致理论界与实务界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毛瑞斯·穆尼茨指出,这种转变的后果之一是实务界与理论界无法交流,学术研究与会计实务各行其是。他建议那些热衷于研究股票市场、股权激励、经济后果的人到别的学科领域去“忽悠”^[9]。

第二,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的数量化分析导向的驱动。罗斯·L. 瓦茨认为,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关于改变管理教育的倡议,是导致会计研究范式发生重大转变的催化剂。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60年代初,鉴于美国大学的工商管理教育在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等方面难以满足社会需要,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分别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大体相同,都主张强化实践导向及数量分析的教育,“形成假设并进行检验是学术研究成功的关键”。之后,大量数学课程出现在美国大学商学院的MBA项目中。美国很多私立高校根本就没有会计本科教育项目,其会计学博士项目往往会招收很多没有接受过系统会计教育的研究生,实证会计的流行正好给他们顺利进入会计领域提供了方便。前面所提及的学者有很多位就是从其他专业转入MBA,然后直接转到会计学博士项目中。这种导向的后果之一就是,大多数北美高校的会计博士教育与资本市场实证研究几乎可以划等号。

第三,美国私人部门的科研经费分配引导学者们尽量少地关注现实问题。采用实证会计范式的主要研究都是由美国证监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资助的;会计师事务所也直接资助学术研究,它们在私立大学中设立了很多讲座教授席位^[10];向大学捐资的企业也不支持带有“批判”属性的研究。由此导致

的结果是,实证研究(经验研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学术研究不再研究会计自身的理论问题,而是着眼于检验会计数据对股票市场、企业行为或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一研究动向终于令那些厌恶学术批评的执业注册会计师们松了一口气。有学者明确地指出:在美国,实证会计研究只是大学教师和博士生热衷的事情,而这几乎不会对会计教育和实务工作造成任何影响。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会计教育仍然在教学生们做会计实务工作,学生们仍然在努力地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学术界实际上是在独立运转。自从实证会计流行以后,会计学术界、会计公司、投资银行等便互不干涉。

第四,学术迎合政治。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英美等国在弗里德曼自由主义的指导下推行放松管制的政策。弗里德曼于1979年成为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他还在1979~1990年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顾问。在新自由主义的大背景下,政府资助了大量倡导放松管制的研究。实证会计作为芝加哥学派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会计和资本市场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追随当时盛行的右翼政治意识形态,使得学术服务于政治目的。随着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过时和共和党的下台,实证会计所宣扬的放松管制主张也显得越来越落伍。

第五,学术期刊大多不愿刊登批评既得利益者的文章。有学者指出,出于职业安全的考虑,缺乏创新精神的编辑倾向于刊发随波逐流的文章而不是创新性的文章。更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像The Accounting Review这类杂志对质疑性的论文充满敌意,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

第六,计算机的应用和数据库、统计分析软件的普及。CRSP数据库和Compustat数据库为金融经济实证研究提供了便利,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统计软件的开发使得实证研究更为便捷。1960年,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研究中心附属的证券价格研究中心开发了CRSP证券数据库。1968年,刚刚于1966年被麦格劳—希尔公司收购的标准普尔公司为东家开发了Compustat数据库。1966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两名研究生开发了统计分析软件SAS。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三位研究生研制了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1975年,SPSS总部在芝加哥设立。1976年SAS软件研究所成立,开始进行SAS系统的开发和销售。证券数据库和统计软件的发展,使得实证范式具备了成本低、产量高的优势。

第七,公司金融理论异军突起,为实证研究提供了真假难辨的待检验假设。1952年,哈里·M. 马可维茨的博士论文“投资组合理论”把金融理论引向了数理化的道路。该文把预期报酬率定义为过去报酬率的均值,把风险定义为过去报酬率的方差,这就是所谓的“均值—方差分析”。“均值—方差分析”是一个无法验证的研究,因为它纯粹是在假设的基础上进行推演,其“贡献”是开辟了金融研究的新范式——数理金融,因此被称为“第一次华尔街革命”,数理统计从此大行其道。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弗里德曼指出,马可维茨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本身够不上经济学博士论文的标准,但马可维茨后来凭借此文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64年至1966年,威廉·F. 夏普、约翰·林特纳和杰克·特里纳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结论是“风险越大、报酬越高”。1970年,尤金·法玛提出有效市场假说。上述成果成为实证会计的法宝。1972年,布莱克、斯科尔斯和莫顿提出期权定价模型,为1973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开张提供了交易规则,这被称为“第二次华尔街革命”。

有效市场假说并不是凭空发展起来的。有效市场假说是金融自由化和放松金融管制运动的派生物。自有效市场假说提出以来,数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指出有效市场假说存在很显著的偏谬,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罗伯特·希勒和劳伦斯·H. 萨默斯等。布拉德·德朗、安德烈·施莱佛、劳伦斯·H. 萨默斯和罗伯特·沃德曼创建了一个模型,证明噪音交易可以导致市场价格与基本价值之间的巨大差异。有效市场假说虽然只是假说,但其传播却往往是以“有效市场理论”等近乎“定理”的面目出现的,它符合证券行业的利益,可谓应时应景^[11]。

事实上,法玛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在理论上根本没法给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评价。再加上多元统计方法本身很容易构造出似是而非的统计相关关系,大样本通常能够得到显著的统计结果,因此,有效市场假说能够确保1970年以来的一些主攻实证研究的会计学博士生按期毕业。这也是实证金融、实证会计比较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既得利益者掌握规则制定权的大背景下,要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实属不易,公司金融理论和统计软件是确保会计学博士生按期毕业的两大法宝。

实证研究的倡导者往往基于库恩的“范式转换”概念,主张以实证研究取代规范研究,这种观点一再

被我国部分学者所强调,但这一切有可能是对库恩学说的误解。库恩的范式转换概念是针对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的历史及其哲学(即科技史和科技哲学)而言的。他提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共识、共同范例和共同承诺,它代表的是一种公认的理论体系、工作纲领。对科学真理的探索不能完全仰赖于“客观性”,而要把主观性的因素考虑在内,因为客观性最终仍然是建立在研究者的主观认知基础上的。不同的范式之间往往是不可通约的。库恩的这一观点是实证研究者开山立派的理论信条,也是前述的《关于会计理论与理论认可的公告》的作者们“集体不作为”的挡箭牌。但是,范式转换是指对原有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延伸和拓展,不是对既有知识的背离,更不是对现有自然科学知识的抛弃。实证经济学的流行也仅仅是流行,离“范式转换”这一概念还有相当大的差异。流行就是流行,它不是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实证经济学与流行服装、流行音乐是同一类概念。

(二)关于主流学术范式(实证会计范式)的批评意见

1. 哈耶克对实证经济学的批评意见。哈耶克,这位社会科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因其自由主义言论而引发广泛争议。就是这样一位涉猎诸多社会科学门类并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者,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银行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还不忘对实证研究方法提出批评。他认为经济学家在经济学领域效仿物理学研究方法的做法有可能导致全盘失误。

2. 实证范式的反对者和倡导者的反思。实证会计从芝加哥大学起步,向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渗透,渐次向亚洲和欧洲传播,但其传播过程仅仅传播了统计软件和公司金融理论,并未形成新的会计知识,这种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反思。

第一,实证会计研究范式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它试图解决的问题一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几乎没有形成知识积累。一波又一波的研究者仍然在检验几十年前的假说,而且一如既往地无法达成共识。文章数量的激增与学术理念的空白形成强烈反差。而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创造知识、服务于社会。美国学者罗伯特·R. 司徒凌曾在1990年做出如下评论:“实证会计有可能做出真正的成果吗?恐怕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千篇一律。20年后,我们周围将会充斥着企业管理层通过操纵会计数据牟利的研究报告。”如今学术界的现状恰如司徒凌早年所言。实证

会计研究范式下常常出现“文章满天飞，一旦结集出版却无人问津”的局面。这可能意味着，学术论文在学术期刊中被循环引用并不代表学术观点被社会实践所认同。

第二，实证研究所阐释的关系过于机械化。实证研究者纷纷致力于研究会计方法与证券价格之间的关系，但为什么准则制定者或企业经理会选择特定的会计方法？实证研究对这一问题难以给出答案。实证会计研究试图解释会计学中的行为关系，试图描述“是什么”而不是对事物作出价值判断。但是，研究者往往必须做出价值判断，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尤其如此。在涉及人的行为的研究中会存在许多种不同的解释，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运用于实证研究^[12]。有学者指出，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存在可以全面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或理论，如果社会科学研究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意味着人性的丧失。

第三，在理论上无法证明实证范式就是科学的范式。实证范式的倡导者也承认，不同的研究范式所采用的是不同的论证规则，因此，采用不同范式的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对“何为有效的研究”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实证会计范式是科学的，那么几十年过去了，实证会计的倡导者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了？如果证券市场里面真的存在定价规律，那么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真正的科学家恐怕早就研究清楚了，也就轮不到半路出家的具有物理、数学、化学等专业背景的学者进行跨界研究。从方法论上来看，社会科学研究者生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不可能保持中立，会计学应当把重点更多地放到解决广泛的社会问题上去。会计研究不应当强调使用统计分析工具，因为统计并不能提供改善社会现状的新思路。

第四，实证范式并不是获得全球共识的会计研究范式。实证范式实际上是芝加哥大学的实证经济学的衍生物。实证会计的早期倡导者多为芝加哥大学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且其先锋人物几乎全都没有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其中，有不少“劳动模范”一再向人们展示，实证范式至少具有毕业快、产量高的好处，制造文章和创造知识可以是完全不相关的两码事。推崇实证范式的杂志也大多由这些人所主导，如1963年创刊的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76年创刊的Accounting,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1979年创刊的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4年创刊的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这些杂志经过私立大学的成功行销，被塑造为北美和英国的“顶级期刊”，推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在欧洲大陆和亚洲，原本并不存在如此明显的以北美范式为导向的学术环境。但近些年来，亚欧某些国家也开始以北美实证范式作为会计研究质量的评价标准，这反映出某些国家会计学术界自信力的缺失。实证范式盛行三十年后，其倡导者也渐渐觉察到，实证范式乏善可陈，难以形成学术积累。

第五，实证范式的方法论和基础理念存在问题。实证范式是以公司金融理论和统计分析方法为基础的。一方面，统计学只能推测统计关系是否存在，它不能够确证因果关系。在大样本统计下，只要样本量足够大，做出任何想要的结论都是有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实证会计数十年来缺乏知识积累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大多数公司金融理论都是失当的。现代公司金融理论中，除MM定理无须验证（其核心思想是强调税法等制度对金融的重要性）以及B-S期权定价公式无法验证外，其余大多理论存在明显的问题。例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本身要求人们估计无风险报酬率并运用 β 系数进行预测，其思维实质是以历史预测未来。有效市场假说只是设想（一种奇思妙想），而不是已经接受检验的理论。正如Grossman-Stiglitz悖论所阐明的，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市场效率和竞争均衡是不相容的，价格不可能反映所有信息。这是因为，如果市场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有关的市场信息，那么投资者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搜集到新的市场信息。而如果投资者不去收集市场信息，那么市场价格又怎么可能反映所有有关的市场信息？由此可见，利用统计工具与公司金融理论所形成的实证会计研究文章的科学性微乎其微。

第六，实证会计本身并不是在研究会计，而是在对会计发表感想。欧美会计学界有学者直率地指出，实证会计所秉持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和哲学理念存在偏差。正如查尔斯·克里斯坦森所指出的，实证会计不是在研究会计的科学问题，而是在探讨会计的社会学问题。易言之，实证会计论文探讨的是会计人员和经理人的行为，而不是会计学科本身的问题。

3. 会计学术界的非实证范式：批判性会计的观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学有专攻的会计学者就认识到居于主流的实证会计研究范式具有殖民化倾向，具有“外行骗内行”的强烈动机。他们奋起反击，在北美自封的“顶级刊物”之外，坚持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会计理论研究。《会计学的批判性观点》《会

计史学家》《会计学与商学研究》《会计学、组织与社会》等众多优秀学术刊物长期坚持刊发“非主流”研究成果,但它们并不被北美那个小圈子归类为“顶尖期刊”。实际上,英国、欧洲大陆国家、澳大利亚的许多学者和美国的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主张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这与唯实证范式独尊的学术虚无化导向形成鲜明对比。例如,托尼·廷克等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会计理论研究,提出了不少创新观点。欧洲一些学者把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运用到会计研究领域,形成了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

自1900年纽约大学创建世界首个商业、会计和金融学院以来,会计学作为大学的一门课程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中,前70年都是规范理论,后40年是实证理论逐渐排挤规范理论的过程。越来越多从来没有做过会计工作、没有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的博士生经过三五年统计训练,毕业后就谋取教职,并与证券行业打成一片,成为证券行业利益的代言人。自实证会计范式流行以来,会计实践并没有发生变化,这意味着什么?

少数北美大学的会计学者运用统计软件和碎片化的奇思妙想来“丰富和发展”会计理论,引领北美会计学术走向了同质化、虚无化、细碎化的发展道路,其前因后果着实发人深省。这启示人们,无论引路人貌似多么有思想,都不要轻易相信。对此,有一个真实的国际笑话可以与实证会计的传播路径相媲美。2013年4月,英格兰东北部首个道路马拉松“北部马拉松”闹出笑话:除唯一一名优胜者,其余全部参赛者(4999名选手)都被跑在队列第二、第三位的选手带着跑错了路线,从而全部失去了比赛资格。

有道是“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学者还是要秉持自身的操守,专注于创造知识,为立法实践、专业实践和专业教育提供支持,而不能让会计学术沦为论文比赛。

●本文为《会计规则的由来》系列文章之八。

主要参考文献:

[1]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胡雪峰, 武玉宁译. 弗里德

曼文萃(上下册)》[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1~200.

- [2] 谢作诗,李平. 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缘起、内容及再解读[J]. 世界经济,2007(12):64~74.
- [3] 朱富强. 盛名难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得主——从一份伟大经济学家的排名表谈起[J]. 海派经济学,2010(1):35~45.
- [4] Beaver, William H.. Financial Ratios as Predictors of Failur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66(4):71~111.
- [5] Ray Ball, Philip Brown.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68(6):159~178.
- [6] Beaver, William H.. Market Prices, Financial Ratios, and the Prediction of Failur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68(6):179~192.
- [7] Ross L. Watts, Jerold L. Zimmerman. Towards a Positive Theor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J]. Accounting Review, 1978(53): 112~134.
- [8] 威廉·斯科特著. 陈汉文等译. 财务会计理论[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300.
- [9] 克雷格·迪根. 方红星等译. 财务会计理论(第三版)[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88.
- [10] 普雷维茨,莫里诺著. 杜兴强等译. 美国会计史——会计的文化意义[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75~378.
- [11] 西蒙·约翰逊,郭庾信著. 丁莹译. 13个银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真实图景[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64~65.
- [12] Harry I. Wolk, James L. Dodd, Michael G. Tearney. Accounting Theory—A Conceptual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 [M]. California: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2001:29~33.
- 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100872; 2.中国人民大学财务会计研究所,北京100872; 3.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创新应用支持中心,北京100872